

理论探索

博物学勃兴与生态写作的整体性视野

□冯 娜

近年来,全球博物学呈现出显著的复兴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过去那种过度追求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加深,自然整体观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类新的共识。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博物学的知识属性高度契合,即重新唤醒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帮助人们重建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本真联系。

博物学形成一股热潮

进入21世纪,博物学专家不断涌现,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在生物学、文学、哲学等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尽管从数量上看这个群体相对小众,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博物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演进也呈现出独特的趋势。早期的博物学涵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然知识,它包含了自然领域多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学科分类变得越来越细致,各个学科朝着高精尖的方向深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观察和科学研究中本应包含的文化、情感因子被逐渐剥离,这一点在以实验室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显著。随着生态观念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构想和理解方式,越来越趋向于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生态化的博物学为人们关注身边环境的“在地性”提供了知识层面的支撑。虽然它无法改变实验室科学在科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能够补充实验室科学的不足,纠正其偏差。它让“体验观察”这一实践方式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打破了专业壁垒,使普通大众也能参与自然探索。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了解自然、亲近自然,而不再仅仅是专业科研人员的特权。

与此同时,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也为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依托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等综合因素,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截至2024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7%的规模。这个数据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并接受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城市中具有阅读能力的群体也空前壮大。博物学知识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人群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类书籍的大量出版,与阅读人群的文化需求息息相关。对于深受焦虑、抑郁、疲于奔命等“现代都市病”困扰的人群而言,博物学类图书所承载的自然、大地、动植物等相关知识及其相关的审美价值与实践路径,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精神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博物学活动当中,在对身边自然物的观察、欣赏与感受中,不断强化了生态主义的理念。

在博物学复兴的浪潮中,博物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拓展和丰富,人文关怀与科学实践相互交融的倾向不断加深。学者刘华杰在对西方博物学的分类研究中,提到了百科全书型、采集型、人文型、综合型等近10种类型后,特别强调了“对于克服科学危机而言,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人文型”。这种人文转向正是博物学在中国复兴过程中的一大特点,也是其吸引人文学界和大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以法布尔为例,他的《昆虫记》长久以来被视为少儿科普的经典之作,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艺术价值愈受到关注。法布尔笔下人与虫之间的有情对话,不仅启发了朱熹椿、半夏、李元胜等当代作家、诗人的昆虫书写,也为博物学的本土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成为当下文化现场的一种

重要趋势。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生态危机的科学策略的探寻上,还体现为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生态危机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剖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的互动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这些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理性视角,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体现了博物学整体性思维的优势,也为博物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博物诗学”这一概念愈发受到关注。有很多学者提出,生态文学批评应以文学为本位,注重作品的审美特性和整体意蕴,从而捕捉作品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深度。这种观点为博物诗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诗性特质。这要求我们从整体性的视角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

“博物”和“生态”的交融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到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大批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大地上的生态保护实践。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品中大量嵌入了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术语。自然科学的词汇,以及现代生物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现代医学、营养学,甚至土木工程等学科的术语,成为文学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叶广芩的秦岭系列作品,通过专业的气象术语和地理学词汇展现了秦岭的地质多样性,使读者对自然生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半夏的《与虫在野》不仅利用现代生物学分类体系和概念术语对昆虫进行科学介绍,还以精确的语言描述了昆虫的形态和习性。另一方面,生态文学作家还通过实证考察、田野调查等方式,精确记录生态保护的真实处境,支撑文本内在的张力。阿来的《西高地行记》《去有风的旷野》《成都物候记》《蘑菇圈》等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就以大量的实地考察记录,真实地呈现了生态现状的复杂性 with 多样性。这种基于实地考察的真实记录,不仅能让读者直观地感受生态问题的现状,也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博物写作甚至成为了一门“显学”。当代作家通过大量的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诗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为背景,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则以神农架为舞台,重申了文学的“森林立场”,追问现实之殇。刘华杰的《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从博物学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了生态意识的重要性。李少君的《自然集》《海天集》、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最美的梨花即将被写出》、胡弦的《沙漏》《猜中一棵树》、雷平阳的《云南记》、李元胜的《无限事》《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江非的《自然与时日》《泥与土》、沈苇的《诗江南》、林莉的《跟着河流回家》等诗集,都表达了对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龙其林、汪树东、谢超、韦清琦、马春光等学者也将研究视野集中投向生态文学批评。

这些生态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点。作家们试图打破人们习惯的类型化与碎片化思维模式,重新唤起一种整体的视野。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将自然共同体的整体福祉确立为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尺度。一切的价值判断,以维系生态整体的动态平衡为基准。这种平衡状态,同时也是评估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坐标。基于这样的原则,生态文学写作回归了生命伦理的本源,即对所有生命形式的普遍关怀。

在生态文学写作中,作家通过构建一个完整、

有机的叙事世界,展现人与自然的深度联系,而非将自然仅仅视为人类活动的附属或背景。例如,在“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缭绕的特使”等诗句中,诗人并没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将人纳入自然的整体之中,让人意识到自己只是生态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生态道德的发现,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类自身位置的重新定位。人类应融入自然的秩序之中,而非居高临下地主宰自然。

地方性知识与整体性的观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态文学写作愈发需要扎根于本土性知识与文化中,从而构建出与具体时空紧密相连的地方性表达。这种表达以本土场域内生成的经验积累为基础,注重特定地理空间形成的在地化知识系统,而非致力于构建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普适性框架。这就涉及我们常常提到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地方性知识产生于具体的环境之中,能够精准地回应具体的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人们在评价这些作品时,经常用到“民族志”“地方志”等术语。作为贴近大地的文学实践,民族志和地方志以地方文化体系为根基,与日常见闻紧密相连。它们能够迅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有助于巩固当地居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它们又是生态写作与地方知识相结合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人与自然密切互动的全新图景。事实上,地方志不仅尝试打破传统文学阐释的学科壁垒,是一种具有介入性特征的文化实践,肩负着现代化背景下守护乡土文化的重要使命,还体现出更广泛的平等精神和切实可行的生态主义诉求。

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开掘往往构成全球生态对话的认知基础。学者梁治平认为:“所谓地方性知识并非同质性知识,更非静止不变的知识。其本身包含异质因素及不同层次,并且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实践中,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互相影响、渗透,其边界不断变化,进而不断生成新的地方性知识。”这种辩证关系在生态写作中体现为:越是深入特定地域的生态肌理,越能触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命题。

生态文学不再局限于对单一地域生态现象的描写,而是将目光投向整个地球乃至更广阔的宇宙空间,通过建立地方经验与全球生态的关联网络,以全球视野和格局审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种叙事转向将特定地域的生态问题置于地球生命共同体框架中加以观照,既保持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又强调作为地球公民的共同责任,促使人们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意义。譬如,诗人沈苇在《一个地区》等诗作中就常常从地方性景观出发,去触及全球性的生态与文化议题。这种多时空维度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生态背景的狭隘认知。它将物象置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生态链的宏观视野中,为人类看待生态整体性提供了视角参照。

总之,尽管生态意识已经受到人类的广泛关注,但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全球化、整体性的生态叙事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通过生态文学的全球化叙事构建更具共生性与整体性的文化未来,已成为亟待突破的创作命题。这不仅关乎文学题材、叙事方式的选择,更关乎跨越国族边界的生态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声音

近年来,在中国各地,书画疗愈、音乐疗愈、舞蹈疗愈、戏剧疗愈、影像疗愈等不断进入大众视野。2026年,“艺术治疗”被正式纳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央美术学院成为首个布点院校,山东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也开设了面向学生或社区公众的艺术疗愈课程。艺术所具有的疗愈身心的力量越来越受到推崇和认可。如青岛市李沧区楼山后社区开展“翰墨疗心·书香生活”书法疗愈公益课。学员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在一撇一捺的书写中“暂时抛开生活琐碎与身心焦虑”,在墨香萦绕中舒缓情绪、释放压力。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舞动愈心”青年志愿者服务团走进济南历城区清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让舞蹈疗愈从校园走向社会。艺术疗愈甚至成为文旅康养行业的营销标签,一些机构纷纷以疗愈身心为旗号宣传造势、吸引关注。一些景区将自身定位为“在喧嚣热闹之外开辟身心休憩空间”,通过举办疗愈音乐会等体验活动,着力打造康养疗愈IP。

这一欣欣向荣的发展热潮当然让人欣喜于艺术社会功能的拓展,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其相伴而生的一些困境与乱象。一是商业浪潮对人文领域的裹挟,资本将艺术疗愈包装成“中产刚需”,过度商业化让“疗愈”沦为消费符号,也导致艺术疗愈质量参差不齐。二是真正具备艺术学、心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综合素养的人才严重不足,从业者资质尚无统一标准,艺术疗愈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建立,出现了“谁都可以做疗愈”的混乱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艺术疗愈活动存在文化内涵被掏空的问题。如一些非遗技艺被贴上“艺术疗愈”的标签,却剥离了其所生长存续的文化语境,其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被忽视。特别是国内不少艺术疗愈实践所沿用的是西方以“情绪宣泄”为主导的范式,与中国人含蓄内敛、重意境体悟的心理认知特征存在天然隔阂,难以引发真正的文化共鸣、实现心灵修复。

上述这些乱象,表面上看是行业标准缺失与过度商业化,深层则是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缺位。因此,在对艺术疗愈行业不断规范的同时,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是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寻求滋养,即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统艺术,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艺术疗愈方式和发展路径。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从不缺少疗愈的智慧。中国人对艺术 with 身心健康关系的思考,有着极为深厚的积淀。《礼记·乐记》中有“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并提出“乐则安,安则久”,认为音乐不仅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感染人,让人油然而生平易、正直、仁爱之心。而内心快乐就会安守本分,安守本分则性命长久。这并非只是在讲音乐,还揭示了通过艺术实现身心和谐的心法。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看作文格完成的最高阶段,强调的正是艺术对精神境界的涵养之功。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通过摒除杂念回归内心的虚静澄明,实质上就是一种深度的心理调节功夫。在历史记载中也不乏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艺养心”的自觉实践。如南朝宗炳晚年多病不能登

艺术疗愈何以可能

□牛光夏

山,便把游历过的山水绘于壁上,卧而游之,在“澄怀”“洗心”中体悟“畅神”之乐。北宋秦观生病时友人送他一幅王维的画,他沉浸其中,“数日良愈”。这些趣闻轶事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艺养心”的自觉实践。

书画、古琴、香道、茶道、花艺,这些流传千年的传统文人雅艺之所以在今天重新受到当代人欢迎,恰恰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安顿身心的方式。中国画追求“气韵生动”,书法讲究“心正则笔正”。这些理念将身体动作、情绪状态与审美判断融为一体,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正念”“具身认知”等理念高度契合,而且有着更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更自然的生活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生命观、身心观,我们的艺术疗愈需深挖中国传统身心治愈哲学,以儒释道核心思想为底层逻辑,融合儒家“修身养性、中庸和合”的情绪调和理念、道家“道法自然、静心归真”的身心松弛思想、佛家“放下执念、觉知本心”的正念智慧,结合中医“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情志理论,结合古代文人书画遗怀、琴乐静心、诗词言志的养心自愈实践,活化传统艺术,打造本土疗愈媒介的矩阵。挖掘适配国人审美与身心特质的传统艺术载体,整合国画、书法、篆刻、剪纸、古琴、古筝、禅乐、传统戏曲、古典舞、太极拳、扎染、陶艺等艺术形式。这类贴近国人生活的传统艺术门槛低、氛围感强,较易令受众产生文化认同,缓解疏离感与孤独感,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疗愈需求的媒介。

“活化”的关键在于“活”,不是把传统供起来,而是让它在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中重新发挥作用。譬如,书法疗愈课之所以能打动居民,恰恰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书法“写得好不好”,而在于居民可在凝神静气运笔中专注感受落笔、行笔、收笔的节奏与韵律,身心随之放松。《毛诗序》提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这种感化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在审美体验中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完成。

艺术疗愈本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祭祀仪式与集体性艺术活动,之所以在今天获得广泛关注,有其现实的社会根基。进入社会转型期,当“内卷”成为日常话语,焦虑不断滋生蔓延时,心理压力不再是别人的困境,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时代症候。而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槛相对较高、周期长,且较为依赖语言表达,许多人面对心理和情绪困扰时找不到合适的出口。艺术疗愈以轻松的、非语言的、体验性的方式回应了这一需求,它不要求参与者具备多么深厚的艺术基础,而注重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参与体验中的情感释放与自我探索,天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面。

中国的艺术疗愈归根结底要扎根传统,从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和壮大。艺术疗愈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能否成为下一个文化消费风口,而在于它能否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有根、有据、有温度的滋养。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新生态,谱写新史诗

(上接第1版)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文学创作的原野无比广阔。”作家王跃文表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奋力担当起描绘新时代、展示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不断锤炼表现能力、创新艺术手法,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汲取素材,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寻求灵感,通过创作把当代中国的荣光与自豪献给历史和未来,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给世界。

五年来,新时代文学深耕现实沃土,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多门类创作齐头并进,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主流,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持续深化,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为之一新。

五年来,中国作协深入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动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融合发展。全力办好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评奖导向引领创作方向,以精品力作标注时代高度。

五年来,中国作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启动“作家活动周”,打造“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品牌活动,组织实施“人民阅读”行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让作家的心与人民贴得更近,让创作的源头活水始终来自人民。

五年来,中国作协坚持拓展文学边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积极推动新大众文艺创作与研究,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大文学观理论研讨,推动新时代文学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持续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会员发展和服务工作水平,构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推进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更加活跃、更有分量。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八方文讯

孙惠芬做客“小说家讲堂”

日前,作家刘恒、孙惠芬,《收获》主编钟红明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围绕孙惠芬最新长篇小说《紫山》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书写展开对谈。活动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主持。

与会者谈到,孙惠芬始终将目光投向故乡庄河及周边地区,带着深切的同情、怜悯与爱,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中体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紫山》描绘了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同时关注人的精神困境,将宏大的社会历史沉潜于细腻的日常经验,显示出厚重的现实主义力量。(张昊月)

专家共话新技术浪潮下的网络文学

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北京作协、北京评协主办的“新技术浪潮下的网络文学”主题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研讨会以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家学者围绕“从科幻到网络文学”“AIGC、网络创作和人工智能关系”“好作品的标准与好生态的培育”等议题,探讨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人与技术是共生共进、双向塑造的,人工智能拓展着人类的认知边界,但不能完全替代人类的思考。新技术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空间,如何以全新眼光和标准评判网络文学,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课题。随着技术浪潮赋能大众趋势日益明显,网络文学自身也呈现出升级迭代和新的审美趋势,彰显出其作为新大众文艺典型样式的活力与潜力。

舒信波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舒信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0月3日在江西南昌逝世,享年92岁。

舒信波,笔名予言,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短篇小说创作技巧漫谈》,文学评论集《文学情怀》《流云烟雨》等。曾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优秀论文奖、江西省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等。

胡良桂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胡良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0月5日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74岁。

胡良桂,笔名娄吾村,中共党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文学史著作《湖南文学史·当代卷》等。曾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秦臻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巡视员、副主席秦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0月6日在山西太原逝世,享年71岁。

秦臻,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乡愁》《有福老汉》《槐花岭人家》《阁楼院纪事》《守望》,散文集《山恋》,评论《赖大嫂不赖——兼谈“中间人物”》《比拟手法是不能不用的》等。曾获山西省优秀小说一等奖等。